

“俄国文学的入侵”

与西欧文学和中国文学相比,真正具有独立民族品格的俄罗斯文学的出现是大大滞后的,它只有200多年的历史。

12世纪80-90年代,古罗斯才出现了一座文学的丰碑《伊戈尔远征记》。它与法国的《罗兰之歌》(1080)、西班牙的《熙德之歌》(1140)、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1200)一起被马克思称为欧洲中世纪的四大英雄史诗。但是,这只是古罗斯文学的昙花一现,用普希金的话来说,“这只是一座孤零零的纪念碑”。此后的500年,俄罗斯文学可以说是一片沉寂,占文学主导地位的是《圣经》的古斯拉夫文译本、使徒传、伪经、布道书、宗教色彩浓郁的编年记事、壮士诗、民间口头文学等。

从13世纪末到17世纪,欧洲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波澜未曾涉及俄国分毫。俄罗斯文学与中国文学更不能相比。到了18世纪的彼得一世时代,随着俄罗斯文化“欧化”进程的开始,西欧文学才进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这100年的俄罗斯文学,无论是题材、故事情节,还是人物,多是对西欧同类文学的模仿,并不具备独立的民族品格,更谈不上在欧洲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这种局面一直到普希金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俄罗斯文学的腾身一跃

《俄罗斯文学的黄金世纪:从普希金到契诃夫》

张建华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1月出版

一个10世纪才拥有文字的国家,何以在19世纪登上世界文学的巅峰?百年来,中国人是怎样接受俄罗斯文学的?作者从普希金讲起,直至契诃夫,通过俄罗斯文学史上的一颗颗文学巨星窥见俄罗斯民族的内心世界。

普希金在继承前人和学习西欧文学的基础上,创造了真正具有俄国民族独立品格的俄罗斯文学,开启了俄国文学的黄金世纪。在短短37年的生命时间里,普希金赶上了几乎落后西欧100年的文学路程。在他的手里,俄国文学来了个大飞跃,开始与西欧文学并驾齐驱。普希金的诗体长篇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1831)与司汤达的《红与黑》(1830)几乎同时面世。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1829-1848)的时候,莱蒙托夫在写《当代英雄》(1840),果戈理在写《死魂灵》(1842年第一卷,1847年第二卷)。此后,俄罗斯文学名家辈出,屠格涅夫、冈察洛夫、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列斯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

如果说18世纪俄国人拼命阅读西欧的文学作品,那么在普希金出现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欧人开始惊呼“俄国文学的入侵”。许多欧洲作家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以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

尔斯泰为老师。到了19世纪80年代,又出了个契诃夫,他在短篇小说和戏剧领域中取得的成就和创新令他的欧洲同行大为惊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这三个俄罗斯文学巨匠对20世纪的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托尔斯泰对法国的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美国的德莱塞、瑞典的斯特林堡以及整个欧洲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契诃夫对美国的欧·亨利和英国的萧伯纳等。

中国人的“导师和朋友”

在中国,阅读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晚清时代。1872年,中国最早出现的介绍西方文化的刊物《中西闻见录》的创刊号上就刊载了俄罗斯的寓言。清末民初,已经有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托尔斯泰的译本。当时辜鸿铭、梁启超、王国维等文化大家均有对托尔斯泰的介绍。

从五四运动开始,俄罗斯文学就成了中国人民重要的外来文化资源,一种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的思想资源,

成为现当代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鲁迅讲,俄罗斯文学是思想火炬,“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在他不同体裁的文学创作中涉及的俄罗斯作家达47位之多。他在《摩罗诗力说》中用了整整一个小节、3000余字的篇幅来评介俄罗斯文学。

在抗日战争时期,俄罗斯文学被看作中华民族解放、救亡文学的范本。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介绍、宣传俄罗斯文学是为了建设自己的革命的民族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俄苏文学成了建设新中国,造就社会主义建设与革命所需要的新人的思想资源。《母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这样的政治需要。在1980年代,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又一次重新回归其启蒙意义,被看作打破现代迷信、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一环。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中译本在1986年的问世恰好应和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

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阅

读、阐释、认知的确经历了一个不断反思、再读、重构的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介绍、宣传、研究俄罗斯文学往往不是从文学本体出发,而是重在教育、精神引领,强调这一文学的进步作用和作家的革命精神。一直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我们对她的认知才逐渐回归文学的本体。阅读俄罗斯文学逐渐成为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的私人志业。俄罗斯文学研究者看到的不再仅仅是启蒙思想和革命精神,还有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状貌。

不能不承认,中国作家从俄罗斯文学的思想发现和审美艺术发现上获得了诸多的启迪并受到了深深的影响。从鲁迅、郭沫若、茅盾到巴金、老舍、曹禺,从丁玲、周立波、郭小川到王蒙、韩少功、余华、张炜、迟子建等,一大批优秀的现当代中国作家都在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中找到过成功、成就的精神和艺术依傍。王蒙说:“少年时代,革命与文学是我的至爱,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我知道了革命与共产党,知道了鲁郭茅、巴老曹,知道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们比生活本身更加宏伟与高尚。”

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国力的衰微造成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化舞台上的低迷与落寞,但其不朽的思想智慧与艺术魔力并不会变质。

全球遭遇新冠疫情冲击以来,媒体报道了很多国家人口增长率创新低的消息。随着2022年联合国发布了最新的人口预测报告,我们能够看到更宏观、更全面、更具趋势性的全球和各国人口状况。其中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2021年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数和地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33个。

对任何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人口负增长都不是值得期待的现象。同时,对各国而言,经历人口负增长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利用跨国数据逐一考察新冠疫情以来的人口负增长现象,以及近30年来经常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的国家数和地区,分类揭示不同国家陷入类似境地的原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警示和启示。这里,我们以2021年人口处于负增长状态的国家为例。这类国家既包括苏联解体后经历过政治经济转型的东欧国家,也包括一些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市场经济国家(见图)。

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转型伊始,就因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而经历了人口负增长,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再回到人口正常增长的轨道上。事实上,在这些国家开始转轨之前,世界上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数和地区少之又少,例如,1985年只



人口负增长的国际经验

《人口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与机遇》

蔡昉著 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3月出版

国家统计局于2023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人口已于2022年进入负增长轨道。这一变化对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经济学家蔡昉从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和特殊挑战出发,阐释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特别是从供需两侧的挑战出发,结合现代化的目标和发展的任务,分析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发展机遇。

有8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人口负增长状态。到1992年,经历人口负增长国家和地区迅速增加到26个,直至新冠疫情暴发前,大体上稳定在这个数字。

可以观察到的事实是,在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随人口波动及负增长而大起大落。即便剔除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特殊影响,所有这些国家转型后都经历了人口负增长,经济增长也都大幅下降。有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有所恢复,但人口增长很难恢复,反过来制约经济增长前景。

为了增进对人口、增长、转型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解,我们可以进行一项反事实的考证,即假设在没有经济政治转型的情况下,人口和经济增长表现是否会有所不同。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我们选择两组国家进行比较,一方是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另一方是

表4-2 2021年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增长率(%)

国家或地区	增长率	国家或地区	增长率
新加坡	-41.7	俄罗斯	-4.4
克罗地亚	-37.4	白俄罗斯	-4.2
摩尔多瓦	-17.9	匈牙利	-4.1
阿尔巴尼亚	-9.3	格鲁吉亚	-3.8
拉脱维亚	-9.1	北马其顿	-3.6
黎巴嫩	-8.3	希腊	-3.4
塞尔维亚	-8.0	波兰	-3.1
罗马尼亚	-7.4	斯洛伐克	-2.1
乌克兰	-7.2	黑山	-1.8
意大利	-6.5	韩国	-1.8
波多黎各	-5.5	古巴	-0.8
波黑	-5.3	西班牙	-0.8
保加利亚	-5.0	德国	-0.4
日本	-4.6	爱沙尼亚	-0.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例如,自1990年以来,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口总体上始终处于负增长状态,2021年达到4.9%这一最大的减少幅度。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人口却始终保持着强劲增长。虽然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均GDP为18569美元,显著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10836美元的水平,但在很长时间里,前者的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低于后者。

2011-2021年,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GDP增长率仅

为2.7%,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达到4.6%。为数不多的几个经历人口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几乎无例外地处于经济极度困难的状态。例如,黎巴嫩经历了严重的外部冲击和内乱;古巴长期遭受美国主导的经济封锁;2021年之前人口一直在减少的委内瑞拉,更是以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著称。

在某种程度上,高收入国家出现人口负增长现象,更为恰如其分地揭示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不过,发达国家之间既有共同点也存在差别,其中一些差别就表现在人口的增长状态上。通过观察,我们可以概括几个相关的特征化事实。

第一,经济增长率伴随人口增长的停滞而下降;在人口越过零增长点时,经济增长率大约同时达到最低点,在很多情况下也跌破零点。如考察

葡萄牙、意大利、日本和希腊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其中,关于日本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负面影响,学术界的研究比较充分。特别突出的一点经验是,日本不仅潜在增长率继续降低,社会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制约效应也日益显现。

第二,经历人口负增长的高收入国家同时表现出投资和消费趋于疲软的特征,社会总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由于受到人口总量效应、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带来的收入效应和财富效应的影响,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从趋势上推动过度储蓄,在这些国家推动形成了长期停滞的基本特征。从这里考察的四个国家来看,除了日本长期具有储蓄大于投资的特征外,其他三个国家都在人口峰值前后,或者发生了储蓄规模超过资本形成规模的相应转折(葡萄牙和意大利),或者在这个方向上迈进了一步(希腊)。

第三,新冠疫情造成人员跨国流动受阻,使那些在更大程度上接受国际移民的国家首次受到极大的影响。鉴于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发达国家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接受地区,新冠疫情和防疫措施对迁移的不利影响使这些地区的人口增长受到抑制。